

September 2021

A Study of the Concept of "Cyborg"

Guodong Li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Li, Guodong. 2021. "A Study of the Concept of "Cyborg"."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41, (5): pp.131-139.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41/iss5/3>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赛博格”概念考辨

李国栋

摘要：“赛博格”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逐渐成了学术研究与大众文化中的流行术语，但其内涵却多有含混之处。从其概念谱系来看，克莱恩斯与克莱因发明的“赛博格”以机器化的人为形象基础，但“赛博格”的释义“控制论有机体”却包含了纯粹的机器。哈拉维对“赛博格”进行了后现代哲学的阐释，将“赛博格”升扬为本体论隐喻与反讽的政治神话，衍生出了抽离所指的赛博格知识话语。这两种阐释丰富了赛博格的实体义与隐喻义，但也造成了赛博格意指的混乱。基于维特根斯坦的理论，“赛博格”所表达的是一个游戏化的词汇场域和类聚化的形象群体，它在具体使用中表现为填补型、器置型、代理型和虚拟型这四种实体类型。如果否认其实体义共识，赛博格就可能会随着无边的隐喻而走向混乱。

关键词：赛博格； 克莱恩斯； 克莱因； 哈拉维； 控制论； 隐喻

作者简介：李国栋，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在读博士生，主要从事文艺理论与文化研究。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59 号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100872。电子邮箱：zhanni469@163.com。

Title: A Study of the Concept of “Cyborg”

Abstract: “Cyborg” has gradually become a popular term in academic research and popular culture since the 1960s, but its connotation is often ambiguou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ts conceptual genealogy, the term “cyborg” invented by Manfred E. Clynes and Nathan S. Kline is based on the image of the mechanized man, but the definition of “cyborg”—“cybernetic organism”—covers the idea of pure machine. Interpreting “cybor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modern philosophy, Donna J. Haraway explicates it as an ontological metaphor and a political myth of irony, producing an intellectual discourse about cyborg that separates the concept from what it originally signifies. These two interpretations enrich the substantive meaning and metaphorical meaning of “cyborg,” but also cause confusion of its signification. According to Wittgenstein’s theory, what “cyborg” expresses is a gamified lexical field and an aggregated image group. It is embodied in four types of entity: the supplementary, the machine-implemented, the agentic, and the virtual model. If a consensus on the substantive meaning of “cyborg” is denied, it may end up in chaos due to the endless metaphors.

Keywords: cyborg; Manfred E. Clynes; Nathan S. Klein; Donna J. Haraway; cybernetics; metaphor

Author: Li Guodong is a Ph. D. candidate in the School of Liberal Arts a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literary theory and cultural studies. Address: School of Liberal Art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59 Zhongguancun Street,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100872, China. Email: zhanni469@163.com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赛博格”（cyborg）逐渐成了航天学、医学、科技哲学、后现代、后殖民、文化研究等不同学科领域中的“关键词”。但这一概念在流行的同时，其语境与用意却总存在差别。仅从“cyborg”的汉语翻译来看，这种含混便相当突出。目前的译法就有“赛博”“赛伯格”“赛博客”“帅博客”“赛博欧格”“西包格”“稀宝”“赛

博人”“赛博格人”“赛博格公民”“电子人”“电子机械人”“电子存在物”“机器人”“半机器人”“机械人”“半机械人”“机械化人”“生化人”“生化电子人”“仿生人”“改造人”“人造人”“合成人”“义体人”“受控机体”“人机合体”“人机结合体”“人机混合体”“机供生命体”“电象主体”等几十种。虽然晚近有统一使用“赛博格”这一音译

的趋势,但其所指却不尽相同,因此对“赛博格”的理解也多有分歧。

这一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赛博格”的语义嬗变。从曼弗雷德·克莱恩斯(Manfred E. Clynes)和纳森·克莱因(Nathan S. Kline)对这一概念的发明,到唐娜·哈拉维(Donna J. Haraway)的后现代哲学阐释,再到当今大众文化的挪用和附贴,“赛博格”的内涵总处于更迭之中;且“赛博格”作为一个前沿性的科技与文化术语,仍有发明与阐释的空间,所以难以加之周全的定义。但从时间跨度来看,“赛博格”从发明至今已有六十年左右的历史,其演变脉络、对象指称、理论得失已有梳理、辨析和反思的必要。本文即从“赛博格”的概念谱系入手,考辨其历史源流、界定逻辑和语义差异,尝试更加清晰地呈现出这一概念的丰富内涵与问题导向。

一、克莱恩斯、克莱因的“赛博格”概念

学界一般认为“赛博格”这一概念的出处为克莱恩斯和克莱因1960年9月发表的论文《赛博格与太空》(*Cyborgs and Space*)。但实际上,这篇论文更早的一个版本是二人在1960年5月向伦道夫空军基地(Randolph Air Force Base)举办的第4次太空飞行研讨会提交的一份名为《药物、太空与控制论:向赛博格进化》(*Drugs, Space, and Cybernetics: Evolution to Cyborgs*)的报告(瑞德 106—108)。这份报告后被收录于1961年出版的《太空飞行的生理心理学问题》(*Psychophysiological Aspects of Space Flight*)一书。但就文献的传播影响来看,《赛博格与太空》因其行文简明和发表时间较早而被广泛征引,遂被看作“赛博格”这一概念的发端点。

“赛博格”概念的诞生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目的,它实际上是苏美冷战竞争的产物。20世纪60年代,苏美太空竞争正处于白热化的阶段,航天领域成为两国心理较量的战场。苏联在1957年10月4日发射了人类史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Sputnik-1),引起了美国心理上的极大惶恐。随后美国便制定了一系列空间发展战略,决意追赶苏联。《赛博格与太空》正是对美国外层空间政策和冷战焦虑的反映。这两位来自罗克兰州立医院的研究员借鉴了二战以来流行的控制论思维,试图通过改变人的生理构造以适应太空环境,从而让美国比苏联更早实现太空旅行的梦想。

作者在《赛博格与太空》一文中表示,改造人体功能以适应外太空环境比改变环境以适应人体生存条件更具可行性。这种功能改造主要通过自动化的人体外接设备来实现,人体与机器将构成一个自我管理系统。为了强调这种新型人类的独特性,以区别于自然人,作者将其命名为“赛博格”。作者说:“由于被外源性拓展的机体复杂功能其实是一个集成的、无意识的内态稳定系统

(homeostatic system),我们提出了‘赛博格’这一术语。为了适应新的环境,赛博格特意加入外源性成分,以扩展有机体自我调节的控制功能。”(Clynes and Kline 27)这一释义一般被当作最初的“赛博格”定义。应该注意到,克莱恩斯和克莱因在这里强调的是“外源性成分”对“人”的加入,“赛博格”在本质上是一种对“人”的拓展,而不是对“非人”的拓展。

克莱恩斯和克莱因所设想的赛博格形象是被改造后的太空宇航员。他们首先以一只皮下植入渗透压泵胶囊(osmotic pressure pump capsule)的小白鼠为例来说明赛博格宇航员的构造,该设备每日自动注射0.01ml的药物,持续200天。像药物控制下的小白鼠一样,宇航员会在外太空环境下自动释放药物来创造生存条件。在这种大胆的设想下,不眠、休眠、心血管控制、肌力维护等27个太空旅行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宇航员俨然成了“超人”般的存在(74—76)。但这些设计方案在现在看来仍然是科幻小说式的幻想,仅靠药物自动装置来构造赛博格几乎不可能完成太空旅行的梦想。

在《赛博格与太空》发表了十年之后,克莱恩斯受《宇航学》杂志之邀写了其续篇《赛博格II:情感的太空旅行》,提出了一种“II型赛博格”。^①他认为在过去的十年里,对太空旅行的技术探索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人们却忽略了宇航员的情感世界。宇航员在太空中会面临孤寂的时空环境,如何满足其情感需求必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如果不在心理学的层面上改变人的“情感本质”,那么宇航员就不能在太空中“舞蹈”,即使他们已经在生理学上成功地被改造了(Clynes 42)。像《赛博格与太空》提出的“生理内态稳定”(physiological homeostasis)方案一样,克莱恩斯也提出了“心理内态稳定”(psychological homeostasis)方案。根据他对“情感周期”(sentic cycles)的研究,他发现情感能够通过一些非语境化的物理刺激来构建控制回路,因为每一种情感的表达都对应着由神经所控制的肌肉运动模式。情感的状态在重复表达中能够自我激发,这一正反馈的发现,使情感在生物控制论(bio-cybernetic)的视角下被看作一个由“状态”(state)和“表达”(express)所构成的系统。通过“情感周期”的特殊控制装置,外部信号的输入可以使实验者产生特定的情感,而在经历了整个情感谱之后,实验者会感觉到异常的平静与满足。在克莱恩斯看来,这种“情感周期”装置完全可以运用到宇航员的身上。如此,宇航员可以在太空中持续体验到平静的感觉,太空旅行对他们来说就不仅是能忍受的,甚至是幸福的(38—39)。《赛博格II:情感的太空旅行》意味着《赛博格与太空》中所描述的赛博格只是“I型赛博格”,也就是说,它只是赛博格的第一阶段或低级类型,而“II型赛博格”则是一种更为彻底的、高级的和本质化的人体改造。

克莱恩斯对赛博格的设想并未就此停止。在后来的

一次访谈中,克莱恩斯表达了他对“Ⅲ型赛博格”“Ⅳ型赛博格”和“Ⅴ型赛博格”的看法。

“Ⅲ型赛博格”仍然基于对“情感本质”修改,它主要有两种构造方式:其一是通过分子生物学知识和计算机技术所制造的人工肽来控制人的情感;其二是通过改变基因的产物或插入新的基因片段来在控制人的情感(Gray 50)。“Ⅲ型赛博格”与“Ⅱ型赛博格”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更为直接地通过神经递质来控制人的情感,而不再需要“情感周期”的特殊装置。

“Ⅳ型赛博格”则在遗传层面做出更加大胆的改造。克莱恩斯谈道:“也许五十年或一百年后,当我们充分了解这些分子与思维、意识和情感之间的关系时,Ⅳ型赛博格就会出现,这样他们就不再害怕改变某些东西,即使是在遗传方面。这样他们就能得到提高并且明显不会有破坏的可能性。那时,参与式进化(participatory evolution)将真正改变人类本质,并向更好的方向发展。”(51)这也就是说,与“Ⅱ型赛博格”和“Ⅲ型赛博格”相比,“Ⅳ型赛博格”从情感学的控制论转向了基因学的控制论,设想出了一种完全通过遗传信息的改变使人类人工进化的途径。但这需要我们对遗传信息的编码方式和基因功能了如指掌。

“Ⅴ型赛博格”则完全是一种科幻式的想象,赛博格成为一个脱离了身体的存在,大脑不依赖于身体获得感觉和知觉,意识能够与其他意识进行直接的交流。克莱恩斯想象:“最终,在几千年之后,我们的大脑可能会存活几千年甚至更久,充满幻觉,集中而强大,拥有多个传感器,也许不需要身体就能存活。身体的愉悦,精神的奋斗,学习,创造,探究和交流都可以脱离身体而获得,我们能够得到今天所梦想的东西。这就是Ⅴ型赛博格。”(52)可见,克莱恩斯对本质修改持有一种高度乐观的心态。在赛博格的进化论中,意识离身将是最终的目标,这意味着人类终于脱离了身体的囚牢,实现了无限的自由。

学界在讨论“赛博格”概念的发生时,鲜有注意到其创始者克莱恩斯还补充了其他类型的赛博格,这导致了其他类型的赛博格形象未被流传与讨论。其实,这些补充可以更充分地解释“赛博格”作为“控制论有机体”的内涵及其问题所在。无论是哪种类型的赛博格,它的基本设想都是基于对有机体的控制论理解,人类主体也因此被理解与控制论主体。“cyborg”从词形上看就明显地反映了这种观念,它的全拼为“cybernetic organism”,所以被称之为“控制论有机体”。

但是,“控制论有机体”还可以作出另外一类比化的理解,即把具备有机特征的机器也当作有机体,因此它也指向了人化的机器,而非仅仅是机器化的人。在《终结者》(The Terminator)系列电影中,由阿诺德·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所扮演的终结者机器人 T-800 就是这种赛博格的典型形象。从“赛博格”作为“控制论

有机体”的词义来讲,这种赋义是符合控制论观点的。控制论之父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认为,机器与人都有着相同的控制论系统,因此二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東西。一方面,机器其实可以看作有机体,它的发明与设计本身就是根据人的生理特征来进行的。维纳指出:“现代的各种自动机是通过印象的接受和动作的完成和外界联系起来的。它们包括感官、动作器和一个用来把从一处到另一处的传递信息加以联结的相当于神经系统的器官[……]近代自动机跟生命体一样,都存在于 Bergson 的时间中。按照 Bergson 的观点,我们没有什么理由认为生命体活动的基本方式一定和模拟生命体的人造自动机有所不同。”(维纳,《控制论》32)另一方面,有机体可以看作机器,它的本质在隐喻的层面上与“消息”这一概念相当。维纳指出:“把有机体看做消息。有机体乃是混乱、瓦解和死亡的对立面,就像消息是噪声的对立面一样[……]我们生命体抗拒毁灭和衰退这一总流的过程就叫做稳态(homeostasis)[……]稳态所要保持的东西就是模式[……]模式就是消息,它可以作为消息来传递。”(维纳,《人有人的用处》83—84)基于这两方面的论述,“控制论有机体”就完全适用于对机器(尤其是自动机和智能机器)的解释,所以“赛博格”包含了不属于克莱恩斯和克莱因所述的含义。

如此一来,“赛博格”虽然是“控制论有机体”的简拼,但二者的词义却并不相同;更准确地说,“控制论有机体”被当作是“赛博格”定义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从控制论本身的学理体系来看,“控制论有机体”更倾向于对智能机器的发明与设计,“赛博格”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工作。维纳就曾指出,他曾研究过两类机器,一类是独立的控制机器,如瓦耳特的向性机器;另一类是辅助性的机器,如人造肢与助听器(150)。事实上,维纳的工作已经包含了几十年来的控制论机器的总体发展方向,即对“有机机器”(瑞德 97)的两种探索。所以,“控制论有机体”其实更符合对“有机机器”的解释,它既包括了克莱恩斯、克莱因的“赛博格”,也包括了没有有机成分的纯粹机器。

凯瑟琳·海勒(N. Katherine Hayles)指出,维纳的著作中有一种突出的类比修辞,它“并非仅仅是语言的装饰品,而是通过关系建构意义的一种强有力的概念模式”(海勒 120)。因此,类比有效地通过控制论建构了机器与有机体之间的相似关系,这样一来,机器与有机体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画上等号,“控制论有机体”也就是“控制论机器”。这或许是导致“赛博格”出现两种理解的根本原因所在。广泛的类比使克莱恩斯和克莱因的定义被“误读”,“赛博格”被同时理解为“机器化的人”与“人化的机器”的双重形象,但后者实际上曾被克莱恩斯强烈反对。他认为,将施瓦辛格所扮演的终结者当作赛博格,完全是对赛博格的曲解,这是在故意制造怪物(Gray 47)。但克莱恩斯的反对无力阻止这类“非赛博格”的大肆流

行。在20世纪80年代,“赛博格”的类比倾向越来越强,直至哈拉维将之重塑为纯粹的隐喻和神话。“赛博格”于是发生了革命性的问题转向。

二、哈拉维的“赛博格”概念

1985年,唐娜·哈拉维在《社会主义评论》(*Socialist Review*)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赛博格宣言:20世纪80年代的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A Manifesto for Cyborg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1980s*),引起了后现代哲学与文化理论家对“赛博格”的广泛关注。^②这篇论文甚至被克里斯·格雷(Chris H. Gray)等人誉为“赛博格学”(Cyborgology)的奠基之作(Gray, et al. 8)。学界普遍认为,哈拉维对“赛博格”概念的阐释提供了一条后现代哲学的思考方式,跨越了科学、哲学与文化之间的学科边界。“赛博格”之所以能够涵盖如此宽阔的问题领域,主要得益于哈拉维对“赛博格”概念的创造性发挥。她以一种后现代哲学的书写方式将“赛博格”升扬为隐喻和神话,从而使其并不局限于人机结合体这类物质性存在,而是成了一个批判性的文化概念。

首先,哈拉维并未明确地界定“赛博格”的含义,而是以一系列赛博格形象作为其阐释的基础。她说:“赛博格是一种控制论有机体,一种机械和有机体的杂合体,一种社会现实的造物,也是一种虚构的造物。”(Haraway, *Manifestly Haraway* 5)又说:“当代科幻小说里满是赛博格,这种既是动物也是机械的造物,遍布了自然与人工模糊不清的世界。现代医学中也满是赛博格,满是机械与有机体的杂合,人们认为所有赛博格都是被编码的设备,它们关系亲密,还拥有并非产生于性史中的力量。”(*Manifestly Haraway* 6)从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现实生活与科幻小说中的赛博格形象是她所描绘的20世纪晚期人类身份突变的合法性依据。但是,哈拉维并未细究“控制论有机体”和“人机结合体”等说法的来源与内涵,因而也就略过了这一概念的内在裂隙。

其次,哈拉维运用了隐喻的手法,将“赛博格”视作了一个本体论的“喻体”。^③哈拉维指出:“二十世纪晚期以来,我们处于一个神话的时代,我们都是喀迈拉(Chimeras),被理论化和编造成了机器和有机体的杂合体,简言之,我们都是赛博格。赛博格是我们的本体论,它把我们的政治给予了我们。”(*Manifestly Haraway* 7)从隐喻的逻辑来看,隐喻涉及两个情境的比较而不是两个事物的比较,隐喻的“喻底”(ground)——类比——具体地说明了两个情境所共享的结构(斯坦哈特 28)。这里所存在的类比是:我们的杂合性与喀迈拉的杂合性是可比的,我们的控制论构造与赛博格的控制论构造是可比的。在这种类比之下,哈拉维就把“赛博格”提升到了本

体论的高度,成了理解人类存在之基的喻体。这个“新隐喻”,“有创造一个新现实的力量。当我们按照隐喻开始理解我们的经验时,这种力量开始起作用;当我们按照它开始活动时,它就会变成一个更深刻的现实。如果新隐喻进入我们赖以活动的概念系统,它将改变由这个系统所产生的概念系统、知觉、活动。许多文化变革起因于新隐喻概念的引入和旧隐喻概念的消亡”(莱考夫 约翰逊 134)。通过“赛博格”隐喻,我们的二元论文化经验就代之以更具杂合性、赛博化的文化经验,我们也就变成了“赛博格”。

再次,哈拉维又将“赛博格”视为一个“政治身份的神话”(Manifestly Haraway 52),这就将“赛博格”抽离了固定的所指,变成了空洞的能指。《赛博格宣言》首句就表明了哈拉维的写作主旨,即“建造一个忠于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反讽政治神话”(5)。作为一种“人工神话”^④,它意味着对传统观念中的身份神话的反抗,即对人类与动物,动物-人类(有机体)与机器,有形(physical)与非有形(non-physical)边界的解构(10—13)。但当“赛博格”成为“神话”的时候,它在语言系统中的“意义”就变成了神话系统中的“形式”;这种转变使它空洞化了,远离了“丰富之物”,因此“它的新的空洞贫薄需要意指作用来充实它”(巴特 149)。这也就是说,作为神话的“赛博格”失去了原来的对象,变成了更具开放性的意指行为。又如罗兰·巴特所说:“蕴含于神话中的信息实际上是一种含混的信息,由随物赋形且毫无边界限定的联想构成。必须特意强调概念的这种开放特性;这绝不是抽象而纯化的本质;这是一种没有固定形态、变化无常、含糊不清的凝结,其统一性和严密性主要取决于功能。”(150)因此,赛博格神话既意味着能指的空洞,又意味着能指的无限增加。巴特谈道:“我可以找到一千个拉丁句子为我说明表语的配合,我也可以寻出一千张图片替我表示法兰西的帝国性。”(150)照这么说,我们也可以找出一千个具有赛博格意味的东西来指涉“赛博格”。哈拉维对“赛博格”的描述就具有这种开放性特征,它包括实验鼠、强化人、喀迈拉、终结者、异形、盖娅^⑤、豆荚人^⑥、乱发虫^⑦……以及边界消解的“我们”(Haraway, “Cyborgs and Symbionts” xi-xx)。

虽然赛博格神话的意指在很大程度上是“任意性”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它仍然受制于“理据性”,正如巴特所指出的,神话的意指作用总是一部分是有理据的,而非完全任意的,它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可类比之处(巴特 156)。从这一点看,哈拉维对赛博格的开放指认仍是围绕着类比进行的。但问题是,神话的“理据性”会因“任意性”越强而变得越弱。巴特指出:“神话是一种纯粹的表意文字系统,形式再现概念,但还是由概念赋予形式理据性,不过远远不能覆盖再现行为的总体。这就像历史上表意文字日渐远离了概念而与声音相结合,于是越来越

变得失去了理据性,神话的减弱、磨损同样也可凭借其意指作用的任意性来确认:医生听诊器之中可以听出整个莫里哀。”(158)哈拉维的野心在于她要将赛博格建构为一个时代寓言,因此她故意保持其词义在技术论和神话学层面的模糊性,“对于哈拉维而言,重要的是要记住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观点,而不是让一方决定另一方”(Pohl 30)。这种模糊性带来了更强的任意性,她甚至在一次访谈中否定了“赛博格”是“人类-机器的混合物”:“我认为,赛博格故事,是一个历史局限相当大的故事,因而它根本不是人类-机器的混合物。我既对历史差异感兴趣,也同样对连续性感兴趣;所以,我认为,从赛博格这个角度来研究我们何所是,其历史是晚近才开始的。”(盖因 29)这似乎表明,赛博格已经成了哈拉维的主观理解了,它在语言系统层面的所指被抛弃了,具有类比能力的“理据性”更弱了,只剩下了可以随意附贴的、开放的空洞能指。

在哈拉维的阐释下,“赛博格”最终走向了“词”与“物”的分离,从一个类型限定中的事物转向了一个更加抽象的、秩序化的观念再现。福柯在《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中指出:“当西方话语笼统地命名了所有表象的存在时,它就是哲学:认识论和观念分析。当西方话语把合适的名词赋予每个被表象的物,并在整个表象领域上布置精心制作的语言网络时,它就是科学——命名法和分类学。”(福柯 129)哈拉维把“赛博格”的含义从科学转向哲学,指向了“所有表象的存在”,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赛博格”走向了一个知识型的“赛博格学”,其分类也因此被新的话语秩序所支配。

如此,哈拉维的“赛博格”就需要我们更多地在隐喻和神话的层面上去理解。在隐喻的层面上,“赛博格”是一个本体论的喻体,它意味着我们是一种具备赛博格特征的主体构造,我们的纯种起源、身份边界和集体性想象并不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作为一个褻渎性的政治神话,赛博格仍然保持着自身的隐喻内涵,但其意指行为则完全开放,其隐喻义便无不指向被讽喻的意识形态。如此,西方意识形态就在赛博格批判中显形,大写的西方主体也因此受到釜底抽薪般的打击。在对赛博格的政治挪移及其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批评中,赛博格展现出了人类异质性分化的事实和重塑革命集体性的可能,女性主义运动也因此获得了一种适用于后人类状态的概念旗帜。但值得注意的是,哈拉维的不连续性表述、定义的模糊和神话学的任意性指涉使“赛博格”这一概念充斥着后现代主义的混乱感,并迎合了一些追随者乐于混乱的趣味。因此,哈拉维的“赛博格”也并非一种权威,需要我们加以批判性地审视。正如丽贝卡·波尔(Rebecca Pohl)所说:“《赛博格宣言》是一部时髦、严肃、执着、充满智慧挑战的著作,它在历史上有过辉煌的接受史[……]但这可能会使一些读者忽略了其中的症结和张力,这就意味着,仔细

(再)阅读,既要考虑到它的用处,也要考虑到它的问题。”(Pohl 66)

三、“赛博格”的实体义与隐喻义之辨

克莱恩斯、克莱因对“赛博格”的发明和哈拉维对“赛博格”的话语拓展最为典型地代表了“赛博格”概念的两条走向:一条倚重科学领域内的“实体义”,在赛博格的科技构造下确定其内涵、形象与知识范畴;另一条倚重后现代哲学的“隐喻义”,对“赛博格”作出本体论和神话学的价值阐释,使其成为能够映射认知结构的抽象名词,从而衍生出了抽离实体的知识话语。这两条走向的并置使“赛博格”经常在实体义与隐喻义之间摇摆,在不同的学科领域、理论体系和问题语境中出现不同的用法甚至冲突。苏·肖特(Sue Short)在其著作《赛博格电影与当代主体性》中就列出六种颇具代表性的“赛博格”含义:

(i) 那些身体装有人造心脏或起搏器等医用假体,或依靠心肺机等机械设备生存的人。因此,从字面意义上讲,技术支持着有机身体。(Short 44)

(ii) 做过整容手术的人,如丰胸或乳房切除术后的重建。这类手术可能还包括侵入性较小的手术,如身体穿孔或佩戴有色隐形眼镜。自然的身体被技术手段改变,以提高审美外观。(44)

(iii) 那些需要长时间进行技术调解(technological mediation)的工作者,如与电脑屏幕或电话耳机打交道。还可能包括从事与机械行为接近的日常重复工作者,例如在工厂工作或诸如输入数据或复印照片等文书工作。个体被他们的劳动产品所异化,特别是在与他人的直接互动中被异化。(44)

(iv) 那些把闲暇时间同样花在与科技打交道的人,如玩电子游戏、上网、看电视或听立体声音响。被选择的娱乐方式是虚拟的,而不是真实的,它依赖于模拟或记录,而不是“真实的”体验。(45)

(v) 那些思维模式和信仰体系由所处环境所塑造的人,特别是充斥于西方日常生活的各种媒体,影响着他们感知现实和自我的方式。因此,意识和认知过程都是由外部刺激塑造的。(45)

(vi) 那些行为模式受到社会法律、家庭经历和文化条件的影响或制约的人。行为是通过社会制度习得的,并通过法律的制裁和公民的赞同/反对得以强化。行动和表达的自由受到

惯例和期望的限制,而这些惯例和期望的规则与编程一样有效。(45)

肖特进一步指出,前四种是当今社会普遍流行的技术层面的定义,后两种则是在意识形态层面的延伸。第五种“赛博格”可以对抗“大众社会”(mass society)中的个体性(individuality)观念,第六种“赛博格”可以重申“赛博格情结”(cyborghood)作为一种从众表现的隐喻内涵(45)。但这两种含义都指特定技术语境中的人,而非被技术加以生理改造的人。在这六种含义的涵盖之下,我们都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赛博格。

对隐喻义的强调,显然会让赛博格的意涵超越其实体对象,这既带来了赛博格隐喻的张力,但也造成了赛博格对象的泛化。保罗·利科(Paul Ricoeur)在《活的隐喻》中指出:“隐喻的地位,隐喻的最内在和最高的地位并不是名词,也不是句子,甚至不是话语,而是‘是’这个系动词。隐喻的‘是’既表示‘不是’又表示‘像’。”(利科 6)在赛博格隐喻下,“像”作为一种同质化的构建力量,将一些本来不属于赛博格实体含义的事物也被建构成了赛博格。常见的例子有:1. 经过科技改造的人:基因编辑婴儿、做过医疗手术的人、打过疫苗的人等;2. 处于控制论系统中的人:飞行员、汽车驾驶员、电脑打字员等;3. 身份混杂的人或动物:双性人、克隆人、异形等;4. 非人的机器:自动化设备、机器人、人工智能等。以上的例子既“不是”赛博格,又“像”赛博格,所以符合赛博格的隐喻,也就经常被直接指认为赛博格。但是,这种指认似乎包罗过广,造成了赛博格的泛滥。

另外,在后现代语境下,过度的隐喻也使“赛博格”面临被消费文化利用的危机。赛博格这一概念自诞生之后便逐渐地被科幻作品所沿用,并随着赛博朋克美学的兴盛而逐渐成为大众文化中的偶像。赛博格因此是一个被市场所青睐的文化符号,成了文学、电影、游戏和广告中的热门主题与形象。面对赛博格的消费价值,一些商家、作者和学者会“拿来”这一概念,将其附贴在非赛博格的事物上,这样也就使赛博格的内涵受到了消费文化的侵害。万百五就此指出,当今商业炒作下的“赛博热”使“赛博格”也受殃及,陷入被“劫持”的状态,从而被滥用于科幻的虚拟怪物,甚至是鼠标、皮包品牌等(万百五 257)。这样一来,赛博格就成了浮光掠影的时尚,它究竟所指何物也充满争议。

为了解决“赛博格”概念的指认困境,我们可以借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和“家族相似”理论。如此,“赛博格”这一词语就不可能具有本质主义的界定,词语与事物也不可能严丝合缝地啮合。更何况“赛博格”也并非一个静态的词语,而是在科技发展中不断获取新的内涵。因此,“赛博格”所表达的是一个游戏化的词汇场域和类聚化的形象群体,我们只能按照其使用规则和历史

形象来加以把握。诚如维特根斯坦所说:“一个词只有在句子联系中才有意义,这就像人们说,一个棍棒只有在使用时才是杠杆。”(维特根斯坦 44)“赛博格”也只有具体的使用语境中才有意义。显然,在赛博格的一般用法中,其语法成分几乎都被当作一个实体性的名词,这就决定了“赛博格”这一概念以其实体性内涵为核心,其隐喻性内涵则需以此为前提。

“赛博格”一般被简单地理解为人与机器结合而成的“人机结合体”。《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对“赛博格”的解释颇具代表性地反映了这一理解:“通过机器或其他外部作用对身体功能的修改,使身体耐受性或能力超出了正常人类限度的人;一个集成的人机系统。”(OED Online)^⑨但这里的“人”与“机器”本身便存在着边界消解的问题,其对赛博格的规定也具有含混性。因此,我们也应将“人”与“机器”看作“家族相似”的概念:其中的“人”既可以是人的肉体,也可以是人的思维,还可以是类人的有机体,等等;其中的“机器”既可以是简单的技术人造物,也可以是复杂的机械,还可以是与机器相关的数字化表达,等等。这种“家族相似”的语言规则使赛博格的形象丰富多变,具体化了“人机结合体”的表现形式。

持此以论,我们可以对医学实践、科技观念以及科幻作品中的赛博格形象进行归纳,从而概括出以下四种实体类型:

1. “填补型”赛博格。这类赛博格将较为简单的仿生材料、装饰品和义体模具与人体相结合,如塑料假肢、仿生牙齿、人工晶状体这类用于医疗的材料,或者是磁铁、金属饰品、硅胶填充物这类用于美容、人体艺术的材料。这些人造物一般只具备填补、修复或美化人体的结构性功能。这类赛博格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科幻小说中都随处可见。

2. “器置型”赛博格。这类赛博格将较为复杂的机械体与人体相结合,如人工耳蜗、心脏起搏器、意念控制假肢等医疗设备,或是电子芯片、人机接口、植入式手表等功能拓展型设备。这些人造物功能复杂,会与身体形成复杂的控制论回路,能够替代或拓展自然器官的功能。这类赛博格不仅在现实中代表着医疗科学的前沿水平,让人类社会充满了科技神话和永生信念,在科幻作品中也大放异彩,像《钢之炼金术师》中拥有机械臂和机械腿的爱德华·艾尔利克(Edward Elric),《机械战警》中仅留下脸部和大脑的墨菲(Murphy),《攻壳机动队》中全身都变成了机械体(只残存大脑和少量脊髓组织)的草薙素子(Motoko Kusanagi),都是此类赛博格的典型形象。

3. “代理型”赛博格。这类赛博格完全以人造身体替代自然身体,因此是人的意识与人造身体的结合。人造身体的材质往往很复杂,可能是机械体、仿生材料和电池等物质的混合体。在技术类型上,人造身体既可以是意

识的遥控对象,像电影《未来战警》(*The Surrogates*)中的“代理人”(surrogate)那样,意识“附身”于人造身体,自然身体则处于休眠状态;人造身体也可以是意识的生存载体,像电视剧《副本》(*Altered Carbon*)中的“袖体”(sleeve)那样,自然身体已经死亡,人的意识储存于“皮质盘”(cortical stack)中,而皮质盘必须要插入“袖体”才能组成“活人”。“代理型”赛博格目前仅出现于科幻作品中。

4. “虚拟型”赛博格。这类赛博格完全以虚拟身体替代自然身体,因此是人的意识与虚拟身体的结合。虚拟身体因为不是实体,所以只能存在于赛博空间中,其具身化形象往往依靠荧屏图像、全息投影或梦幻想象呈现。《黑客帝国》中的拟真世界就是一个可视化的赛博空间,人类通过脑机接口可以在赛博世界拥有一个仿真的虚拟身体,其感官体验与现实世界中的几乎无异。电视剧《上传新生》(*Upload*)中的赛博格则完全舍弃了现实世界的肉身,人的意识上传到数据库中,并在一个湖景优美的赛博社区里拥有一个虚拟身体。“虚拟型”赛博格目前也仅出现于科幻作品中。

按照这一粗略的分类,赛博格就可以建立起一个共识性的实体内涵,这也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谓的语言游戏之“规则”。这一“规则”表示着“赛博格”的相对边界,而这正是赛博格隐喻的基础。必须要注意到,隐喻发生的前提首先是事物之间的差异:将某物比作赛博格,不仅是因为二者很“像”,而且是因为二者原本“不像”。这也就是上文提到的利科对隐喻的解释:隐喻中的“是”既表示“不是”又表示“像”。如果遗忘了二者的差异,而将“像”当作“是”,那么就会造成隐喻的失范与对象的错置。后现代主义乐于制造混乱,哈拉维式的后现代写作将赛博格的混乱视作一种反抗策略,然而这种混乱也正是后现代主义的症候:只谈隐喻而不求实在,只搞破坏而不讲规则。如此,“赛博格”就难免成为一个捕风捉影、鸡零狗碎的概念。

结 语

“赛博格”作为当今后人类主义的核心概念之一,具有相当重要的文化位置与批评价值。克莱恩斯和克莱因对赛博格的发明开创了它在科技现实层面的实体性内涵,哈拉维对赛博格的后现代阐释则张扬了它在主体批判层面的隐喻性内涵。“赛博格”的实体义与隐喻义都为后人类的现实境况与主体境遇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坐标,成为赛博格概念史上殊途同归的两条进路。但作为一个流行时间尚短的概念,“赛博格”也显示出了后现代主义式的碎片化、消费化与浅表化的症候。这一方面是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氛围使然,但另一方面则是来自于实体义与隐语义之间的冲突。西方学界曾发出建设“赛博格学”的宏大心愿,追求对赛博格的跨地域、跨学科和跨文化研

究(Gray, et al. 11)。这就更加强对“赛博格”作为一个研究对象的共识性理解。如此,我们就需要尽量去弥合赛博格实体义与隐语义之间的裂隙,为“赛博格学”的话语建设制定相对的规范。当然,“赛博格”仍是一个正在变迁的概念,其实体指向与隐喻内涵还有待进一步地讨论与反思。

注释[Notes]

① 此文原为作者在1970年应《宇航学》(*Astronautics*)杂志之邀而作,但最终却未能发表。后来,该文被克里斯·格瑞收录于《赛博格手册》一书(Clynes 35-42)。

② 这篇论文后更名为《赛博格宣言:20世纪晚期的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A Cyborg Manifesto: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收录于哈拉维1991年出版的《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和2016年出版的《宣言的哈拉维》(*Manifestly Haraway*)等著作中。

③ 在隐喻中,存在着“本体”与“喻体”两个部分。例如在“花瓣是蝴蝶”这一隐喻中,“花瓣”就是“本体”,“蝴蝶”就是“喻体”。

④ 哈拉维用赛博格神话这一“人工神话”来抵抗西方二元论神话,潜在地呼应并实践了罗兰·巴特的神话抵抗策略。巴特指出:“实际上,抵御神话的最佳武器,或许就是转而将神话神话化,就是制造人工的神话:这种重新组织的神话就成为真正的神话修辞术。神话既然劫夺了(某物的)语言,那么,为什么不劫夺神话呢?只需使神话本身成为第三符号学链的起端,拿神话的意指作用充当次生(第二)神话的第一项,这就可以了。”(巴特 166)

⑤ 这里的“意义”与“形式”是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术语。巴特指出了神话中的两种符号学系统:一种是“语言系统”,它是初生的符号学系统;另一种是“释言之言”系统,即神话系统,它是次生的符号学系统。这两种系统各有“能指”“所指”和“符号”三项,其中,神话的“能指”既是语言系统的终端(“符号”),也是神话系统的开端,因此它有两个名称,在语言层面上它被称作“意义”(sens),在神话层面上它被称为“形式”(forme)。另外,神话的所指被称作“概念”(concept),神话的符号被称作“意指作用”(signification)(巴特 145-147)。

⑥ “盖娅”(Gaia)在这里指詹姆斯·拉伍洛克(James Lovelock)的“盖娅假说”,他认为地球是一个有生命的“控制论有机体”,可用“盖娅”来代称(拉伍洛克 180-181)。

⑦ 这里的“豆类人”(pod people)指《天外魔花》(*The Invasion of the Body Snatchers*, 1956)电影中的诡异形象。该影片讲述了一种植物形态的外星生物来到地球,复制出了许多以假乱真的假人类,最后控制了地球。被外星植物侵袭的人表现出半植物半人的形态,然后渐渐被植

物吸干。最终,外星植物的巨大豆荚会吐出一个与真人无异的复制人。

⑧“乱发虫”(Mixotricha paradoxa)是一种共生的单细胞生物,生活在澳洲白蚁的消化道内,能够帮助白蚁消化吃进去的纤维素,释放白蚁能够消化的化合物。乱发虫的全部动力来自它的几十万个螺旋体,它们密密麻麻地像头发一样覆盖在整个细胞的表面(马古利斯 萨根 62—63)。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罗兰·巴特:《神话修辞术》,屠友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 [Barthes, Roland. *Mythologies*. Trans. Tu Youxiang.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6.]
- Clynes, Manfred E. "Cyborg II: Sentic Space Travel." *The Cyborg Handbook*. Ed. Chris H. Gray.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35—42.
- Clynes, Manfred E, and Nathan S. Kline. "Cyborgs and Space." *Astronautics* September 9(1960): 26—27, 74—76.
- 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
- [Foucault, Michel.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Trans. Mo Weimin. Shanghai: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6.]
- 尼古拉斯·盖因:《如果我们从来都没有成为人类,以后应该怎么办?——唐娜·哈拉维访谈录》,蔡新乐译,《差异》(第5辑),金慧敏主编。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15—44。
- [Gane, Nicholas. "When We Have Never Been Human, What Is to Be Done? Interview with Donna Haraway." Trans. Cai Xinle. *Difference*. Vol. 5. Ed. Jin Huimin. Kaifeng: Henan University Press, 2008. 15—44.]
- Gray, Chris H. "An Interview with Manfred Clynes." *The Cyborg Handbook*. Ed. Chris H. Gray.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43—53.
- Gray, Chris H, et al. "Cyborgology: Constructing the Knowledge of Cybernetic Organisms." *The Cyborg Handbook*. Ed. Chris H. Gray.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1—14.
- Haraway, Donna J. "Cyborgs and Symbionts: Living Together in the New World Order." *The Cyborg Handbook*. Ed. Chris H. Gray.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xi—xx.
- *Manifestly Harawa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6.
- N.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

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刘宇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 [Hayles, N. Katherine. *How We Became Posthuman: 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 Literature, and Informatics*. Trans. Liu Yuqi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7.]
- 乔治·莱考夫 马克·约翰逊:《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何文忠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
- [Lakoff, George, and Mark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Trans. He Wenzhong.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 詹姆斯·拉伍洛克:《盖娅:地球生命的新视野》,肖显静、范祥东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180—81。
- [Lovelock, James. *Gaia: A New Look at Life on Earth*. Trans. Xiao Xianjing, Fan Xiangdong. Shanghai: Truth & Wisdom Press,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9. 180—81.]
- 林恩·马古利斯 多里昂·萨根:《倾斜的真理:论盖娅、共生和进化》,李建会等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62—63。
- [Margulis, Lynn, and Dorion Sagan. *Slanted Truths: Essays on Gaia, Symbiosis, and Evolution*. Trans. Li Jianhui, et al. Nanchang: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99. 62—63.]
- OED Online, June 2021. 4 August 2021 <www.oed.com/view/Entry/46487>.
- Pohl, Rebecca. *An Analysis of Donna Haraway's 'A Cyborg Manifesto':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Macat International Ltd, 2018.
- 保罗·利科:《前言》,《活的隐喻》,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1—7。
- [Ricoeur, Paul. "Foreword." *The Rule of Metaphor*. Trans. Wang Tangjia.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4. 1—7.]
- 托马斯·瑞德:《机器崛起:遗失的控制论历史》,王晓,郑心湖,王飞跃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
- [Rid, Thomas. *Rise of the Machines: A Cybernetic History*. Trans. Wang Xiao, et al. Beijing: China Machine Press, 2017.]
- Short, Sue. *Cyborg Cinema and Contemporary Subjectivit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 埃里克·查尔斯·斯坦哈特:《隐喻的逻辑:可能世界之可类比部分》,兰忠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

- [Steinhart, Eric Charles. *The Logic of Metaphor: Analogous Parts of Possible Worlds*. Trans. Lan Zhongpi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9.]
- 万百五:《21 世纪控制论综述评论集——纪念控制论创立 70 周年(1948—2018)》。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8 年。
- [Wan, Baiwu. *A Review of Cybernetics in the 21st Century: Commemorating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Cybernetics (1948-2018)*. Guangzhou: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2018.]
- 诺伯特·维纳:《控制论:或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信的科学》,郝季仁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年。
- [Wiener, Norbert. *Cybernetics: Or,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the Machine*. Trans. Hao Jiren.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09.]
- :《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与社会》,陈步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
- [——. *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 Cybernetics and Society*. Trans. Chen Bu.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全集》(第 3 卷),R. Rhees 编,丁冬红,郑伊倩,何建华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年。
- [Wittgenstein, Ludwig. *Complete Works of Wittgenstein*. Vol. 3. Ed. R. Rhees. Trans. Ding Donghong, et al.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 2003.]
- (责任编辑:王嘉军)

(上接第 106 页)

- [Wang, Xiaoyi. “Guo Xiang’s Theory of Sageand the Philosophy of Human Mind and Nature.” *Philosophical Researches* 2(2003): 46-51.]
- 萧统编:《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 [Xiao, Tong, ed.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86.]
- 萧子显:《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2013 年。
- [Xiao, Zixian. *The Book of Southern Q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3.]
- 杨立华:《郭象〈庄子注〉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
- [Yang, Lihua. *Research on Guoxiang’s Notes of Zhuangzi*.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 杨儒宾:《“山水”是怎么发现的——“玄化山水”析论》,《台大中文学报》30(2009): 209—254。
- [Yang, Rubin. “How Isthe ‘Landscape’ Discovered — An Analysis of the Xuanhua Landscape.” *Chinese Journal of Taiwan University* 30(2009): 209-254.]
- 郑毓瑜:《引譬连类:文学研究的关键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 年。
- [Zheng, Yuyu. *Citation and Analogy: Key Words of Literary Researches*.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Beijing, 2017.]
- 钟嵘:《诗品集注》,曹旭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
- [Zhong, Rong. *Annotated Ranksof Poetry*. Ed. Cao Xu.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4.]
- 任博克:《玄冥:王弼与郭象的理》,陈霞译,《中国哲学史》3(2006): 24—36。
- [Ziporyn, Brook. “Coherence in the Dark: The Theory of “Li” in Wang Bi and Guo Xiang.” Trans. Chen Xi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3(2006): 24-36.]
- (责任编辑:查正贤)